

中东剧变与土耳其的政治和外交转型

魏 敏*

内容提要 中东剧变给土耳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土耳其在正发党领导下，在政治层面实现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政治体制变革，消除了未遂政变、里拉危机的重大威胁，在外交层面成功实现了由传统的凯末尔主义“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外交思想到“积极进取”外交政策的转型。面对中东剧变后纷繁复杂且危机四伏的中东局势，土耳其充分发挥其地缘政治优势，实现了对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确保了国家安全利益，还与利比亚民主团结政府签署了地中海划界协议，参与了地中海油气资源争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耳其的战略利益与安全利益。在中东剧变带来的内外影响下，土耳其不断推动政治改革进程，国内政权得以巩固，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和主导权也明显上升。

关键词 中东剧变 土耳其 政治体制变革 外交政策

土耳其以及“土耳其模式”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典范，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初期深受突尼斯、埃及等发生动荡国家的推崇。随着埃及“二次革命”和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向，以埃尔多安总理在埃及人民广场发表讲话为标志，土耳其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国家形象也达到顶峰。随后，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与居伦组织分裂导致土耳其内部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在地区局势和国内政治分裂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土耳其开启了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且在外交事务中态度和立场日趋强硬。

* 魏敏，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一 中东剧变助推土耳其政治经济与外交政策调整

19 世纪晚期以来,土耳其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再到议会共和制的多次转型。1950 年,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结束了共和人民党一统天下的局面,土耳其开始实行多党民主制。^①然而,在共和政体和民主的多党政治制度框架下,总统处于弱势地位、总统与总理二元政治问题、军人干政问题引发的政治分裂、政治波动和两极分化成为影响土耳其政治进程的历史痼疾。^②现代土耳其是个没有阶级偏见、却有着森严社会等级的社会,^③城市与广大乡村、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矛盾长期存在。2002 年正发党执政后就开始了一系列政治变革,世俗派精英对埃尔多安及其政党代表的新保守阶层非常不满,正发党也一直在世俗政治和保守的伊斯兰势力间寻找平衡,不仅积极推动土耳其政治改革和加入欧盟,而且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伊斯兰教发展的政策法规,放宽在社会生活领域对伊斯兰教的限制,但阻力巨大,进展缓慢。中东剧变后,叙利亚危机和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两个因素有力地推动了土耳其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一系列调整。^④在这一进程中,正发党不仅逐步实现了扩大其政党影响力、增强执政地位的政治意愿,而且充分发挥选举制度赋予的政治合法性优势及其在长达十余年的执政过程中积累的政治经济资源和民意基础,通过渐进方式较为顺利地实现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重大政治变革。^⑤

(一) 中东剧变助推土耳其政治体制转型

中东剧变后,民众提出的民主和变革诉求直接冲击着土耳其政党和社

① [美] 罗德里克·H.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刘同舜译,学林出版社,1996,第1页。

② Ergun Özbudun, *Party Politics and Social Cleavages in Turkey*,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2013, p. 4.

③ [美] 罗德里克·H.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刘同舜译,学林出版社,1996,第9页。

④ Sinan Ülgen, "A Transformed Turkey: What Is the Role for Ankara as a Regional Power?"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2, No. 2, 2012, pp. 41-50.

⑤ 魏敏:《从议会制到总统制与土耳其政治发展》,《当代世界》2019年第11期。

会。随着埃及“二次革命”和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民主运动在中东呈蔓延之势，土耳其国内爆发加齐公园事件以及由于政府腐败事件引发的民众抗议，再加上库尔德问题，有专家预言，“阿拉伯之春”有可能成为土耳其重要选区的榜样。^①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正发党积极推动国内政治变革进程，启动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重大变革。

首先，中东剧变提出的变革需求助力土耳其国内政治气候变化，为正发党政治改革提供了政治环境。正发党执政后已经开启了渐进式政治改革，提出了“民主倡议”，旨在正式承认不同族裔的文化身份，尤其是库尔德人的文化身份的政策，目的是重新定义和重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根据现有公民的社会文化构成的各种差异，注入新的公民意识。^②此项倡议遭到反对，未能实施。2010年5月，涉及土耳其共和国司法体系和限制军方权力的宪法修正案顺利获得通过，^③此次修宪从法理上削弱了土耳其军方权力和司法独立权，长期被视为土耳其世俗主义主要捍卫者的军方和最高法院两股力量遭受重挫。2014年8月，土耳其举行历史上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埃尔多安以“国家意志 国家权力”作为竞选口号成功当选。^④随后，埃尔多安明确提出将通过修宪扩大总统职权，将土耳其变为总统制国家。随着埃尔多安个人政治威望日盛，土耳其政府权力日趋集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总统制雏形，也为正发党下一步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其次，中东剧变推动了土耳其的政治制度变革。中东剧变期间，民众提出的最基本需求是社会民主化以及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⑤叙利亚危

① Henri J. Barkey, “Turkey and the Arab Spring,” *Carneig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6, 2011, <https://ir.cas.lehigh.edu/content/turkey-and-arab-spring>.

② Isabel David, “Strategic Democratisation? A Guide to Understanding AKP in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Vol. 24, No. 4, 2016, pp. 478–493.

③ 萨哥特：《土耳其修宪削弱军权和司法独立权》中国青年网，2010年9月17日，http://article.cyol.com/qnck/content/2010-09/17/content_3826820.htm。

④ Soner Cagaptay and Beril Unver, “Why Recep Tayyip Erdogan Will Be Turkey’s First Directly Elected President,” August 6, 2014, <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cagaptay-turkey-erdogan-reelection-20140807-story.html>.

⑤ Ertan Özensel and Gökhan Bozbas, “The Effect of the Arab Spr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urkish Conservative Tradition and Policies,” *Hemispheres*, Vol. 29, No. 2, 2014, p. 29.

机升级后,叙利亚逐步占据了土耳其外交事务的中心地位。正发党借机塑造民主价值观捍卫者的形象,不断巩固国内民意基础。这一时期,向叙利亚“民主力量”提供支持成为土耳其政治家在国内外演讲的主题之一。捍卫民主价值观提升了正发党的政党形象,执政党在国内选民心目中的地位增强了。^①在此背景下,正发党充分发挥选举制度赋予其的政治合法性优势,借势加速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政治体制转型。2017 年 4 月 16 日举行的修宪公投境内投票获得 51.4% 的选票,宪法修正案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②2018 年通过提前大选,埃尔多安总统成为总统制后首任总统,正发党与民族行动党组成的人民联盟获得执政地位。

此次政治体制变革强化了总统地位,赋予了总统更多的权力,加剧了威权主义。而威权主义所强调的国家征税能力、强制能力和行政能力^③对土耳其政治体制和行政部门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伴随着由议会制向总统制的转型,政府的行政效力成为稳定制度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促进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能力,以及规范商业活动的能力得到提升,为土耳其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土耳其经济频受冲击

土耳其正发党 2002 年执政后,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浪潮推动下,土耳其步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土耳其模式”一度成为中东国家民主化和结构调整的榜样。2002 ~ 2013 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 8.96%,以美元计价的人均 GDP 从 2002 年的 3580.71 美元,增加到 2013 年的 12480.37 美元,增长了 249%。^④也正是凭借经济增长业绩,土耳其步入 G20 国家行列,并且成功进入“展望五国”、“灵猫六国”

① Szymon Ananicz, “Helpless and Lonely: Turkey’s Attitude Towards the War in Syria,” May 12, 2014,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commentary/2014-05-12/helpless-and-lonely-turkeys-attitude-towards-war-syria>.

② 王云松:《政体改变 土耳其走向总统制》,《人民日报》2017 年 4 月 18 日,第 21 版。

③ David White and Marc Herzog, “Examining State Capacity in the Context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Regime 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Russia and Turkey,”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16, Issue 4, 2016, pp. 551 – 569.

④ 《土耳其议会选举今日举行 经济形势左右选民投票》,第一财经网,2015 年 6 月 7 日, <https://finance.jrj.com.cn/2015/06/07133519323454.shtml>.

和“E11”行列。^①

长期以来，中东国家，如阿联酋、沙特、伊朗、伊拉克、埃及都是土耳其的重要贸易伙伴，尤其是该地区的石油输出国也是土耳其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国。2011 年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相继与埃及、利比亚、沙特关系交恶，并且在卡塔尔与沙特关系产生危机时站在了卡塔尔一边，引发海合会国家对土耳其投资大幅下降。2018 年货币危机后，只有卡塔尔承诺投资 170 亿美元，以帮助土耳其解燃眉之急。^②

中东剧变后，土耳其与海合会国家关系变化影响双边贸易。长期以来，在欧洲和中亚、东亚和太平洋、西亚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北美、拉美和加勒比七大贸易地区中，西亚和北非地区是土耳其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土耳其出口贸易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土耳其 2010 年与西亚和北非国家的贸易额达 441.59 亿美元，其中，出口占土耳其出口总额的 16.63%，进口占土耳其进口总额的 4.47%，实现贸易顺差 126.42 亿美元。^③ 2018 年，土耳其与西亚国家贸易额达 586.34 亿美元，其中，出口占土耳其出口总额的 21.88%，进口占土耳其进口总额的 9.8%，实现贸易顺差 149.02 亿美元。虽然，2010~2018 年土耳其与西亚国家贸易额平均增长率为 4.09%，^④ 从土耳其财政收入来看，叙利亚战乱，尤其是与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家关系交恶造成对海湾国家出口额下降和旅游收入锐减，同时土耳其获得的投资也大幅下降，土耳其的损失巨大。

中东剧变后，受地缘政治影响，土耳其国内经济频繁遭受冲击。2013 年土耳其偿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决定走一条自主的经济发展道

① 展望五国（VISTA）的概念由日本“金砖四国”经济研究院负责人门仓贵史在 2007 年提出，由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的英文首字母组成，意为展望、眺望。灵猫六国（CIVETS）由《经济学人》于 2009 年提出，由哥伦比亚、印尼、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的英文首字母组成。博鳌亚洲论坛 2010 年年会首次提出“E11”（新兴经济体 11 国）概念，这 11 个新兴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

② Anonymous, “A Special Relationship How Qatar and Turkey Came Together,” *Economists*, May 1, 2021,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1/01/21/how-qatar-and-turkey-came-together>.

③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ITS), June 1, 2020,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TUR/Year/2010/TradeFlow/EXPIMP/Partner/by-region>.

④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ITS), June 1, 2020,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TUR/Year/2010/TradeFlow/EXPIMP/Partner/by-region>.

路。然而,2016 年 7 月 15 日土耳其爆发未遂军事政变,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支出法计算)从 2015 年的 6.09% 下降到 3.18%,^①成为正发党执政后除 2009 年外的最低增长水平。2018 年 8 月,土耳其与美国关系交恶再次引发里拉货币危机,致使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速(支出法计算)从 2017 年的 7.3% 降为 2.83%,2019 年为 0.88%。^②货币危机的溢出效应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致使土耳其经济目前增长乏力。土耳其急需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因此,缓解与地区国家关系、扩大双边贸易并吸引投资成为土耳其的重要选项。

(三) 中东剧变后土耳其外交政策急剧调整

中东剧变颠覆了包括利比亚在内的之前与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的中东国家政权,也极大地考验了正发党的“零问题”外交政策。围绕中东剧变后叙利亚危机的不断升级,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两次重大调整。一次是叙利亚问题产生后,土耳其对叙外交政策的调整,即放弃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支持反政府力量,同时打击库尔德人势力,阻断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库尔德人的联系。另一次是从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后,土耳其由最初的与俄罗斯对抗到与俄罗斯战术联盟的逐步确立。2017 年“伊斯兰国”被击溃后,土耳其采取更为积极主动,可谓激进的外交政策取向,以期在叙利亚问题的发展走向及战后叙利亚政治局势重构中发挥其作用和影响。^③

在与大国关系层面。中东地区未来的大国博弈中一方是土耳其的传统盟友美国和北约,另一方是强势重返中东的俄罗斯,土耳其的选择和外交倾向为纷繁复杂的中东变局再添变数,也增强了中东局势的复杂性。2005 年 12 月,土耳其开始入盟改革,虽然成为欧盟成员一直是正发党政府的主要目标,并且在其执政期间进行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但土耳其入盟进程并不顺利。中东剧变后产生的难民问题和欧盟对土耳其威权政治的不

①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ITS), June 1, 2020,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TUR/Year/2010/TradeFlow/EXPIMP/Partner/by-region>.

②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ITS), June 1, 2020,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TUR/Year/2010/TradeFlow/EXPIMP/Partner/by-region>.

③ Yaşar Yakış, “Turkey after the Arab Spring: Policy Dilemma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1, No. 1, 2014, pp. 98–106.

满致使土耳其与欧盟关系陷入低谷。中东剧变后，土耳其与美国的矛盾最初体现在美国在叙利亚危机中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以及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后美国对“居伦运动”领导人的庇护，随后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趋近且土耳其做出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决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土耳其借故推迟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启动时间，同时为美国提供大量防疫物资和设备，尤其是针对利比亚问题，不排除土耳其与美国重修旧好联合应对俄罗斯的可能。

在与地区国家关系层面。首先，土耳其对伊拉克库尔德人采取了激进主义的外交政策，通过空袭等手段对伊拉克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实施打击。2015 年底，土耳其开始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驻军。其次，土耳其发动了“幼发拉底河之盾”、“橄榄枝”和“和平喷泉”三场军事行动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进行军事打击。在 2017 年 3 月的战斗任务结束后，土耳其部队仍留在叙利亚北部以维持缓冲区并保护那里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此举引发俄罗斯与伊朗的不满。最后，在海合会危机中土耳其与卡塔尔结盟，并试图削弱沙特的影响力，与沙特争夺中东地区主导权。目前来看，中东剧变后并没有出现土耳其所期望看到的有利局面，即一方面中东国家随着民主进步都会将土耳其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可发挥自身优势，帮助中东国家更好地适应国际社会。^① 土耳其充分认识到，积极参与叙利亚问题可以在国际社会和北约内部凸显土耳其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土耳其的经济社会发展，这将极大地缓解土耳其目前在中东地区面临的外交孤立。

二 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变化的根源

长期以来，欧盟和美国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决定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走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土耳其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欧盟资金，而加入欧盟被视为土耳其政治和经济发展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土耳其非常关切的库尔德人问题上，欧盟一再要求土耳

① Ahmet Davutoglu, “Zero Problems in a New Era,” *Foreign Policy*, April 26,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3/03/21/zero-problems-in-a-new-era/>.

其对库尔德工人党保持克制,美国针对库尔德人问题也对土耳其施加了很大压力。中东剧变后,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变化有其深刻的内外部原因。

(一) 土耳其政治体制重塑与正发党外交政策的变化

正发党自第二个任期开始就开启了对土耳其的政治体制改革。2007 年修宪成功,不仅削弱了军方权力和司法独立权,也强化了政治体制中的政府权力。埃尔多安于 2014 年 8 月通过全民直选当选总统后,重申土耳其将以人道主义方式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外交政策。^① 2015 年,正发党在首次议会选举中失利,随后再次赢得议会选举并获得独立组阁权。土耳其的外交理念转向以多元价值为基础,重新构建土耳其全球大国地位。^②

在“战略纵深主义”外交思想指导下,土耳其一方面寻求摆脱与北约、美国和以色列的传统结盟关系对土耳其外交的束缚,另一方面加强与中东地区国家的联系。土耳其表示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不赞成以色列 2008~2009 年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并开始寻求与伊朗和叙利亚这两个对美国中东政策影响最大的国家进行接触。尽管坚定的世俗主义仍然是现代土耳其意识形态的主流,但历届政府已经无法抵制通过控制宗教机构对土耳其社会施加影响的诱惑。同时,土耳其还意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伊斯兰教国家样板,扩大其在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③ 土耳其外交理念的变化,促使其由先前相对谨慎的外交政策转向激进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 2012 年 10 月授权政府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成为中东剧变后土耳其激进外交政策的发端。

(二) 大国中东政策对土耳其的影响力下降

西方国家中东政策的改变削弱了其对土耳其外交的影响力。首先,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阿拉伯之春”后的难民问题成为欧盟不愿处理的重

① Anonymous, “Turkey’s First President Elected by Popular Vote,”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April 10, 2018, <https://www.tccb.gov.tr/en/news/542/3205/turkeys-first-president-elected-by-popular-vote.html>.

② Birce Bora, “More of the Same Foreign Policy under Ak Party?” Al-Jazeera, November 9, 2015.

③ Jenny White, *Muslim Nationalism and the New Turk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

大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且，随着英国脱离欧盟，极右势力在各国迅速崛起，其余成员国经济增长乏力。对于欧洲各国政府来说，叙利亚、伊拉克或阿富汗难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欧盟目前的状态表明，它对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已经削弱，只能通过批评土耳其的独裁表达对土耳其未来政治发展的忧虑以及自身的无能为力。土耳其对欧盟的现状和需求非常清楚，埃尔多安总统曾扬言，除非欧盟为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做更多的事情，否则土耳其就要打开防止难民的闸门。其次，美国对土耳其的影响力也已下降。由于美国国会的抵制和五角大楼没有放弃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支持，土耳其在无法获得“爱国者”-3（PAC-3）导弹的情况下选择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而这一购买决定激怒了美国国会，美国威胁土耳其必须放弃俄罗斯导弹，否则将对其进行制裁，并将土耳其排除在F-35战斗机计划之外。美国国会甚至搬出了《以制裁法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严厉警告土耳其。土耳其不仅未对美国的威胁表现出畏惧，而且以土耳其将关闭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因吉利里克空军基地和库雷吉克雷达站作为回应。土耳其不仅购买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而且还表示有意购买俄罗斯的苏霍伊苏-35（Sukhoi Su-35）战斗机。土耳其与西方大国权力均势的这种变化增加了土耳其在中东和东地中海的影响力。近期，对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岛周围进行的炮舰外交，欧盟表示强烈谴责。除法国直接介入东地中海争端外，欧盟各国似乎无暇顾及东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博弈。

（三）土耳其国内对经济增长的需要更为迫切

正发党执政后，充分运用选举制度，通过一次次的选举实现土耳其政治体制转型。但在历次选举和公投中，为了能够胜选，政府出台了大量刺激经济的举措和满足选民需求的福利政策，致使政府支出缺口巨大，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长期在30%左右徘徊，^① 政府的刚性支出使得调控经济发展的能力大幅度下降，造成经济增长缓慢。2013年至今，土耳其面临经济增速下滑，通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经济发展困境，其主要原因是土

① Anonymous, “Turkey Government Debt to GDP 2000 – 2020 Data,” Trading Economics, May 1, 2021,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turkey/government-debt-to-gdp>.

土耳其经济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埃尔多安总统对经济的过度干预。2018 年 8 月爆发的里拉危机可谓给转为总统制后的土耳其以沉重一击，使得土耳其成为继阿根廷和南非之后，出现严重经济问题的第三个新兴经济体。此次货币危机凸显土耳其经济高通胀、高利率、高贸易逆差和高外债且债务结构不合理的痼疾，其溢出效应不仅造成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严重影响微观企业债务偿付能力以及银行业稳定，其对土耳其政治社会的深刻影响也会在今后逐步显现。因此，土耳其迫切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发展经济，保障民生。

（四）埃尔多安的强人领导风格

塔伊普·埃尔多安（Tayyip Erdogan）于 20 世纪 90 年代步入土耳其政坛。从伊斯坦布尔市市长到政府总理，再到国家总统，土耳其不仅跻身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之一并且成功实现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转型。在埃尔多安担任总理期间，土耳其逐渐放弃了现代土耳其的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采取的谨慎的外交政策。倡导建立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埃尔多安总统领导下的土耳其渴望重新建立其对巴尔干、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影响力。中东剧变后，凯末尔提倡的“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外交思想被新的“积极进取”外交政策所取代，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惯于在威胁发生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不仅体现在外交政策中，也体现在埃尔多安应对国内政治转型的一系列举措中，最为典型的是 2018 年 6 月的提前大选，当时为了应对经济挑战和日益复杂的叙利亚局势，避免各种不确定因素，埃尔多安宣布与民族主义政党结盟，推动政治体制向强有力的总统制转型。埃尔多安性格中善于把握时机和果断的行事作风使其成为土耳其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埃尔多安对于国内政治和国际趋势的把握及决策，进一步巩固了其权力，也扩大了土耳其的影响力。

三 中东剧变对土耳其外部环境的影响

中东剧变后，土耳其积极参与地区事务，运用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手段逐步成为影响中东局势走向的重要力量。目前来看，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

向，尤其是频繁运用军事手段，不仅削弱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对土耳其国家安全以及领土完整构成的威胁而且实现了在叙利亚北部建立安全区的目标。然而，中东剧变后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为土耳其未来政治经济发展埋下了隐忧。

（一）土耳其实现了对叙利亚北部的实际控制

中东剧变尤其是叙利亚危机造成了土耳其实际控制叙利亚北部地区的现实。叙利亚目前的分裂状态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设置了障碍。2019年10月30日，叙利亚政府、叙利亚反对派和各个民间社会团体的约150名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了叙利亚新宪法大会。^①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盖尔·佩德森（Geir Pedersen）在开幕式上强调，为了建立“可信、包容和非宗派治理的新宪法”，谈判各方必须在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的基础上进行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并且各方谈判由“叙利亚人拥有，叙利亚领导”^②。然而，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存在成为推行新宪法的主要问题。

（二）土耳其国内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土耳其的军事行动虽然会在初期迫使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撤离，但从长期来看，库尔德人将尽其所能捍卫自己的领土，新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现在叙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区关押“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监狱中约有1万多囚犯，其中有2000~3000外籍囚犯。^③ 若土耳其不能有效控制这些监狱，恐怖分子有可能重返中东其他国家以及欧洲、中亚等地区，对地区局势和安全造成新的威胁。在叙利亚外部，域外大国美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和地区力量——伊朗，都在尽最大可能使局势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在叙利亚内部很难形成统一立场，巴沙尔政府、各类反对派武装以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相互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纠葛，叙利亚爆发新的军事冲突以及“伊

① 《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再次启动 成为推动叙政治进程的有效途径》，央视网，2019年11月25日，<http://m.news.cctv.com/2019/11/25/ART1loOOc1c8Q9tlgAMuifee191125.shtml>。

② Anonymous, “Security Council Unanimously Adopts Resolution 2254 (2015), Endorsing Road Map for Peace Process in Syria, Setting Timetable for Talks,” United States, December 18, 2015, <https://www.un.org/press/en/2015/sc12171.doc.htm>.

③ Tom Michael, “Do You Want Them Home?” *The Sun*, October 1, 2019, <https://www.thesun.co.uk/news/10044008/isis-syria-jail-british-fighters/>.

斯兰国”恐怖组织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土耳其将面临新的安全挑战。

(三) 土耳其国内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尽管“伊斯兰国”组织被打散,但其影响力和分支机构依然存在,且存在发动报复性袭击的可能。巴格达迪自 2010 年领导“伊斯兰国”后,迅速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西北、东北等地壮大,并在 2014 年宣布建立一个地域横跨叙伊边境的“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筹融资渠道依然存在,支持恐怖袭击的财力约有 3 亿美元。^①此外,“伊斯兰国”在中东、北非、东南亚等地建有 12 个分支机构。虽然在美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政府和库尔德武装的相互配合下已将巴格达迪击毙,“伊斯兰国”武装“政权化”存在被终结。巴格达迪之死是“伊斯兰国”失去武装根据地后的又一惨重损失。但是,滋生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环境依然存在,并且,巴格达迪在传播和实践其恐怖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已经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地区领导人和潜在接班人,巴格达迪之死有可能引发新一波报复性袭击浪潮,未来土耳其国内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四) 难民安置缺乏资金支持

尽管正发党在执政前十年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但是没有强劲的经济就无法实行“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②随着土耳其军队进入叙利亚和利比亚,该党“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已经实现,但是安卡拉方面却缺乏维持这种政策所需的大量资金。土耳其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发动“和平喷泉”行动,此次行动首个阶段是要在土叙边境设立长约 100 公里、宽约 30 公里的安全区。在这一安全区得到巩固后,再沿边境线建立总长 480 公里、宽约 30 公里的安全区,并将目前分散于土耳其各地的共计约 350 万叙利亚难民中的 250 万人安置于此。^③正发党的最终目的是要与 2016 年的“幼发拉底

① 周意珉:《Web2.0 技术在“伊斯兰国”崛起中的作用及影响》,《和平与发展》2015 年第 4 期。

② Ertan Özensel and Gökhan Bozbas, “The Effect of the Arab Spr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urkish Conservative Tradition and Policies,” *Hemispheres*, Vol. 29, No. 2, 2014, pp. 29–53.

③ 张获:《土耳其“和平喷泉”军事行动目标能否实现》,中国青年网,2019 年 10 月 10 日, http://news.youth.cn/gj/201910/t20191010_12090451.htm。

河之盾”行动和2018年的“橄榄枝”行动已经形成的态势相呼应，彻底摧毁库尔德人形成的叙北联邦，消除土耳其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隐患。从经济方面来看，土耳其也不具备回迁安置叙利亚难民的实力。经测算，回迁安置计划将需要240亿欧元（约相当于26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自2008年里拉危机后，土耳其国内经济处于恢复中，截至2019年底，土耳其国内经济增长率为0.88%，同比下降1.9%，通胀率为15.26%，失业率为13.9%，青年人失业率高达27.1%，并且外部债务居高不下。^①2015年叙利亚难民危机爆发后，土耳其已经利用欧盟的支持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了140个新村庄，每个村庄5000人，并在50个地区安置了100多万叙利亚人，每个地区30000人。^②到目前为止，欧洲国家不可能对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进行的反库尔德人的尝试再次提供援助，回迁和安置叙利亚难民的资金来源将成为土耳其建立安全区的主要障碍。

结 语

中东剧变改变了中东的政治格局。地区传统权力中心发生转移，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的中心地位逐步让位给安卡拉、利雅得、阿布扎比、特拉维夫和德黑兰。与三个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相比，阿拉伯国家集体失色，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还被三个非阿拉伯国家所主导。^③中东剧变初期，由于土耳其高估自身影响力和出现战略误判，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陷入困境，不仅未能按照预期扮演地区发展榜样与秩序塑造者的角色，还因其冒进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受挫，本国安全与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随后，日益深化的地区危机使土耳其面临巨大压力。尽管土耳其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西方国家曾经标榜的“土耳

① Anonymous, “Turkey Government Debt to GDP 2000 – 2020 Data,” Trading Economics, May 1, 2021,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turkey/government-debt-to-gdp>.

② Shelley Inglis, “Syrian Refugees in Turkey Are There to Stay, at Least for Now,” October 24, 202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syrian-refugees-in-turkey-are-there-to-stay-at-least-for-now-125176>.

③ 唐志超：《秩序、意识形态和模式之转换——中东剧变以来的地区政治发展》，《西亚非洲》2020年第5期。

其模式”也不再受推崇，总统制下的土耳其似乎也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①但是，土耳其的发展路径具有鲜明的特征。其一，埃尔多安总统及其所领导的正发党在土耳其政坛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国内政局稳定。其二，现行总统制具有鲜明的过渡特征。2019 年市政选举结果表明，在野党及其政治新秀已经在土耳其地方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三，尽管中东剧变后，土耳其民众抵制专制统治的心理门槛有所提高，但民众改变政治格局和争取政治权利的意识已经增强。2021 年 2 月 1 日海峡大学师生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埃尔多安总统任命与执政党关系密切人士出任该校校长，要求授予该校自主选举校长的权力。其四，发展经济是执政党的要务，经济增长与民生问题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基础，经济增长乏力和高失业、高通胀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其五，外交服务于内政。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正是基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以及地区战略环境的考虑，其外交政策主要围绕邻近国家和地区、土耳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尤其是能源利益三大核心展开，频受冲击的经济状况明显削弱了土耳其干预中东地区事务的能力。其六，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相持不下，土耳其社会分化日益严重。2020 年 7 月 10 日，埃尔多安总统宣布将圣索菲亚大教堂由博物馆改为清真寺，^②引起轩然大波。土耳其在正发党领导下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全面转型，既是对土耳其发展内外现实的应对，也是对土耳其发展模式的新探索。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和 2021 年 3 月刚刚爆发的又一次里拉危机给土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尽管中东剧变对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影响将长期持续，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埃尔多安总统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必须将重点放在国内政治和经济增长上，这也被视为土耳其未来新进程的基础之一。埃尔多安总统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能否在土耳其政坛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仍需观察。

[责任编辑：张向荣]

① Turan Subaşat, “Turkey at a Crossroa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urkey’s Transformation,” *Markets, Globaliz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 No. 2, 2017, p. 6.

② 齐倩：《土耳其宣布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引发欧美俄众怒》，观察者网，2020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0_07_12_557316.shtml。

Abstract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urkey's Politics and Diplomacy

Wei Min

Abstract: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brought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urke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AKP, Turkey has realized the politic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from parliamentary system to presidential system at the political level, The major threat of the attempted coup and the lira currency crisis has been removed, and successfully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diplomatic thinking of Kemalism— “home peace and world peace” to an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 at the diplomatic level. Following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icated and crisis-ridden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gave full play to its geopolitical advantages, struggling in regional affairs and attacking from all sides. It not only achieved actual control of northern Syria, ensure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but also cooperated with the democratic unity government in Libya, signed the Mediterranean demarcation agreement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for Mediterranean oil and gas resources. Within 10 years after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s domestic power has been consolidated, and its influence and dominance in regional affairs have als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Keywords: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Politic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Foreign Policy